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晏智杰◎主编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 概论

[法] 让·巴蒂斯特·萨伊◎著

赵康英 等◎译



史上最受欢迎的经济学经典

★★★
超值
白金版

萨伊作为亚当·斯密思想的伟大继承者和传播者，其创立的“萨伊定律”至今仍是西方经济学的信条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晏智杰◎主编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 概论

〔法〕让·巴蒂斯特·萨伊◎著

赵康英 符蕊 唐日松◎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经济学概论 / (法) 萨伊 (Say, J.B.) 著; 赵康英, 符蕊, 唐日松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4.1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913-4

I. ①政… II. ①萨… ②赵… ③符… ④唐… III. ①庸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IV. ①F09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2309 号

政治经济学概论

作 者 [法] 让·巴蒂斯特·萨伊
译 者 赵康英 符蕊 唐日松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482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网址: www.hxph.com.cn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 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

2 政治经济学概论

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绪 论

只有当我们明确界定研究的计划和对象时，一门科学才能必然进步，否则，我们只是松散地掌握少数真理，而未发觉其联系，看到大量错误，却不能发现其谬误。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严格限定于研究社会秩序所根据的原则的政治学（politics），与阐明财富是如何生产、分配及消费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相混淆。然而，财富基本上与政治组织无关。在任何政体下，一个国家只要事务处理得当，都可能繁荣兴旺。很多由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奔向富裕，而很多国家却毁于人民议会。如果政治自由更有利于财富的增加，那么其作用是间接的，正如政治自由间接地更有利于公共教育一样。

某些学者在研究时把良好政治的基本要素与国家财富或私人财富的增长所依存的原理混淆起来，这就难怪他们使上述问题模糊不清而不能阐明了。斯图亚特（Stewart）将自己著作的第1章题名为“人类的政治”（of the Government of Mankind），他就应受到这样的指责。20世纪经济学派的所有著作，以及卢梭（Rousseau）在《百科全书》（Encyclopedie）中的文章“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都应受到同样的责难。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起，似乎一直将这两个相差甚远的研究区分开来。“政治经济学”^①这个术语现在只用于论及财富的

① “经济”（economy）一词源自希腊语 οἶκος（家庭）和 νομος（法），即管理家庭的法规。按照希腊语，“家庭”一词包含家庭所拥有的一切动

2 政治经济学概论

科学，而“政治学”这个术语只用于阐明政府及其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国相互关系的科学。

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涉及纯政治学领域的广泛范围，似乎在当时为把农业、商业和技艺包括在这方面的研究内提供了一个更充分的理由。因为农业、商业和技艺是财富的真正来源，而法律对财富只有偶然和间接的影响。这样就产生了很多漫无止境的离题论述。例如，如果商业构成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所有各种商业都形成其中的一部分，其结果是海洋商业、航海、地理等也形成其中的一部分。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包括进去的呢？人类的所有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因而我们必须确定它们的接触点，即联系不同分支的接合部，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地了解其特性和共性。

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在研究到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时，所研究的只是这些行业与财富的增加或减少有关的方面，而不是这些行业本身。这门科学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商业确实有生产力，在什么情况下一人所得是另一人所失，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商业对所有人都有利。政治经济学还教授我们鉴别商业的各运行过程，但仅限于这些过程的结果。但商人熟知他们所经营的货物，这些货物的优点与缺点，生产这些货物的国家，这些货物的市场，这些货物的运输方法，交换这些货物应付出的价值，以及记账方法。

同样的论述也适用于农场主、制造商和实业家。要透彻了解每种现象的因果，他们都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要成为自己所在行业的专家，他们还必须了解所在行业的运行过程。不过，斯密博士并未把这些不同的研究主题相混淆，但他和在他之后的学者都没防范另一个混乱来源。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应该注意到，因为这种混乱所引致的发展，对于一般知识的进展以及特殊研究的进行，也许不是完全没用的。

产，而源自希腊语 πόλις（城邦）的“政治”一词的应用，则延至一般社会或国家。政治经济学是我们能用来称呼本书所探讨的科学的最好词语。这门科学不是研究天然财富（natural wealth）的，即自然界无偿无限提供给我们的财富，而是专门研究社会财富（social wealth）的。社会财富的基础是交换以及承认财产权，而这二者均产自社会制度。

政治经济学像物理学以及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在尚未确定事实前就已形成了学说体系，用大胆假设来代替事实。自培根（Bacon）时代对所有其他科学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哲理推究归纳法产生以后，这种方法才应用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研究。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只承认经过细致观察的事实，以及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严密推论，从而有效地排除在文学和科学领域常常干扰人们获得真理的偏见和权威。可是，对于如此经常使用的“事实”（facts）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我们是否完全理解？

在我看来，这个词既表示**存在的物体**（objects that exist），又表示**发生的事件**（events that take place），所以它表示两类“事实”。例如，这样一个物体存在着，是一类事实；这样一个事件发生着，是另一类事实。“存在的物体”，若要作为一定推论的基础，则必须以各种观点来观察其真实情况下的各种性质，否则，当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对同一事物进行推论时，实际我们有可能是在同一名称下论及两个不同的事物。

第二类“事实”，即“发生的事件”，是在我们观察它如何发生时所展现出来的现象。例如，金属处于一定热度时变为液体，这是一个事实。

事物如何存在或如何发生，构成所谓的**事物本质**（the nature of things）；而对事物本质的细致观察，则是一切真理的唯一根据。

因此，科学可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叙述科学**（descriptive science），它整理并正确指明一些物体的性质，例如植物学（botany）和博物学（natural history）；另一类可称为**实验科学**（experimental science），它阐明物质间的相互作用，即因果关系，例如化学和物理学。这两类都是以事实为根据，并且构成知识的可靠的和有用的部分。政治经济学属于后者，它说明有关财富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因而构成实验科学^①的一部分。

① 为了证明事件为什么以某种方式发生，即为某一结果指出某一原因，实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是描述性的。为解释日食，天文学必须证明月亮不是透明体。同样，为了说明货币是生产财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揭示货币的真实性质。

但“发生的事件”可从两个观点来考虑，即从一般的（general）或不变的（constant）观点，以及从特殊的（particular）或可变的（variable）观点来考虑。一般事实（general facts）是事物在所有相似情况下由其本质所产生的结果。特殊事实（particular facts）确实也是由事物的本质所产生的结果，但它是几个行为在特殊情况下相互作用的结果。前者与后者尽管貌似相互矛盾，但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在物理学上，重的物体向下降落，这是一般事实。然而，喷泉的水却向上升起，喷泉这个特殊事实是均衡规律和地球引力规律相结合的结果，而不是破坏了这些规律。

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关于这两类事实即“存在的物体”和“发生的事件”的知识，涉及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这两门不同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根据那些始终经过细心观察的事实，使我们了解财富的本质；根据关于财富本质的知识，推断创造财富的方法，阐明分配财富的制度和随财富灭失而出现的现象。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阐明其所观察到的与这个主题有关的“一般事实”。就财富而言，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结果及其原因的知识。它说明哪些事实始终相结合，从而一个事实始终是另一个事实的结果。但它不靠假设来进一步说明。从某些事物的本质必然会理解其联系这一点来看，政治经济学必须引导人们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以便每个有理解力的人都能清楚地理解这个链条是如何联系起来的。现代哲理推究方法的优点正在于此。

统计学说明某国在特定时期生产和消费的数量，该国的人口、军队、财富以及其他可估计价值的东西。统计学是详细的叙述。

政治经济学与统计学之间的差异，和政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差异相同。

统计学的研究也许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但如果它不能指明它所搜集的事实起源和结果，就绝不会为人们带来益处；而如果它能指明这些事实的起源和结果，就立即变为政治经济学了。这无疑这是这两门不同科学迄今还被混淆的原因。亚当·斯密博士的名著，只能视为无序集合在一起的、富有启发性例证的最正确的政治经济

学原理，以及融合有益意见的统计学的天才研究。然而，它不是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完整论著，而是一大堆不规则的稀奇古怪的原创性论断和已知的已被证明的真理。

我们能得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完整知识，因而可以发现构成这门科学的所有一般事实。而统计学的情况却绝非如此。这门科学类似历史学，是对很多不确定从而必然不完全的事实的叙述。关于从前和遥远国家的统计，我们只能得到孤立的、极不完全的记载。至于现代，几乎无人能既具备良好观察者的资格，又占据一个有利于准确观察的地位。尽管研究者不辞辛劳地搜集详尽的正确材料，却常常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例如，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不正确的记载，面对来自某些政府甚至个人的无休止的猜忌、恶意和冷淡；而即使研究者掌握了详尽的正确材料，毕竟也只是暂时真实的。因此，斯密博士声称，他不太相信政治算术，那只不过是许多统计数据的整理而已。

相反，只要构成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原理是从不可否认的一般事实中严密推断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是不可动摇的。一般事实无疑以个别事实的观察为依据，但这些个别事实必须是从最细致观察、最严密证实并由我们目睹的个别事实中挑选出来的。当这些事实的结果始终相同，并且它们之所以相同的原因已令人满意地指明，并证明其他原理的这些事实的例外也严密证实时，我们才可以将它们视为基本的一般事实，并有信心将其提交给所有胜任的研究者去研究，而他们可能想把这些事实再交付实验。如果一个新的个别事实是孤立的，并且它和它前后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并未通过推论证实，那就不足以动摇我们对一般事实的信心，因为谁能说某一未知情况不会带给我们与所看到的上述事实不同的结果之间的差异呢？人们看见一根轻羽毛在空中上升，有时在空中停留很长时间，然后才落回地面。可是，如果我们得出羽毛不受万有引力定律影响的结论，难道不是错误的吗？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一般事实，即利率随贷款者所承担的不能收回货币成本的风险大小而提高或降低。如果我们看到货币在冒很大风险的情况下被借出，能够就此推断上述原理是错误的吗？也许贷款者不知道风险，也许他对借款者的感激或恐惧使他付出牺牲。而受到特殊情况干扰的上述一般规律，当干扰因

素停止作用时，就会恢复其全部力量。最后，完全核实的特殊事实是多少？而其中各方面都观察到的事实又是多少？并且即使假设这些特殊事实得到仔细核实、细心观察及充分叙述，其中又有多少是不能证明或能证明任何东西与它们所要证明的恰恰相反？

所以，没有一种荒谬理论或狂妄主张未曾援引事实作为依据。^①使政府如此频繁受到误导的，也正是事实。但了解各种事实，而不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不能指明为什么一个事实是原因而另一个事实是结果，那么这种知识其实比机关职员の未经整理的资料强不了多少。这些职员中最聪明的人都很少熟知超过一个方面以上的知识，从而使其只能从单一观点来研究一个问题。

没有什么比把理论（theory）与实践（practice）对立起来更无意义的了！如果理论不是关于联系结果和原因或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规律的知识，那么理论究竟是什么呢？与从各方面观察事实并理解事实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家相比，谁能更熟知事实呢？如果没有理论的实践，^②如果只是运用方法而不知方法是如何发生作用或为什么发生作用，这种实践究竟是什么呢？在任何研究中，把不同情况当作相同情况对待，是一种很危险的经验主义，会产生从未预料到的结论。

因此，在看到文艺复兴后整个欧洲普遍采用排他性或限制性商业制度，即基于一国只能从另一国的损失中获利这一理论的商业制度之后；在看到赋税反复不断地增加，而且在某些国家增加到极为庞大的数量之后；在看到这些国家比它们在实行无限制贸易以及几乎完全免除人民负担的时期更富庶、更兴旺、更强大后，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国家的富强可以归因于对企业的限制和对个人收入所征收的赋税。头脑肤浅的人甚至声称，这种看法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而与此相反的各种看法都是胡思乱想。

① 1813年是法国最悲惨的时期，当时的对外贸易崩溃，国内各种物资迅速减少。而法国内政部长在陈述那年的情况时夸口说，无可置疑的统计（calculations）证明，法国处于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

② “实践”（practice）这个词，在这里并非指工匠或职员能更迅速、更准确地进行日常工作并成就他们特殊才能的手工技能，而是指管理和监督公众或私人事务时所运用的方法。

与此相反的是，很明显，持相反看法的支持者所掌握的事实的范围更广泛，并且比他们的反对者更理解这些事实。他们知道，使世界上最机智的民族更富强的真正原因是，在中世纪对意大利各自由邦和北欧汉萨城镇的产业所做的非常强烈的刺激，这些地方所呈现的富裕景象，与十字军所带来的各种思想的冲击、艺术和科学的进步、航海技术的改进带来的印度航路和美洲的发现，以及与接连发生的许多其他重要性程度略低的事件有关。尽管他们知道，这种能动性不断受到抑制，但他们同时知道这种能动性已从抑制性更强的阻碍中解放出来了。随着封建领主权力的削弱，各省和各邦之间的交通不再被阻断；道路改善后，旅行更安全，法律也不像从前那样武断；享有自治权的市、镇变为直接依赖于国王，它们发现国王对它们的进步很感兴趣；这种自治权由事物的自然演进和文明进程而推广到整个国家，使各个生产者都能保有其劳动果实。在欧洲各地，个人自由更加受到尊重，这如果不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改善所致，至少是受到舆论的影响。一些偏见——例如将所有有息贷款蔑称为高利贷，重视贵族的悠闲——开始减少。不仅如此，开明人士不仅注意上述这些事实的影响，而且还注意许多其他类似事实的影响。他们发现，偏见的减少有利于科学的进步，或有利于更准确地认识不变的自然规律；他们还发现，科学研究的这种进步，本身就有利于产业的进步，而产业的进步则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由这种对事实的归纳，他们能得出比未曾思考的大众所得出的结论正确得多的结论，即尽管许多现代国家在赋税和限制中走向富强，但其原因不是对人类事务自然发展的限制，而是因为这些强大的抑制因素也未能阻止这些国家走向富强。如果这些国家实施更自由和更开明的政策，那么会更为繁荣。^①

① 所以，各国很少从经验的教训中获得任何益处。要从中受益，一般社会必须要掌握因果关系，这就假设人们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解力和少见的思考能力。只要人类处于从经验中受益的境况，他们就不再需要经验的教训，这时只需平常的正确判断力就足够了。这就是我们必须不断接受管束的一个原因。人民所期盼的全部，就是应当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社会总体利益的法律，这是不同政治组织或多或少都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要获得关于真理的知识，并非必须了解大量的事实，必须掌握的是基本的、有直接影响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从各方面来研究这些事实，使我们能从这些事实中推出正确的结论，确保我们所认为的由这些事实产生的结果确实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任何其他关于事实的知识，如年鉴上的广博知识，只是汇编事实，并不产生任何结果。应注意的是，这种知识是那些记忆清晰而不能明察的人所特有的。这些人攻击最为确定的学说，而这些学说是广泛的经验和深刻推论的结果。只要这些学说与他们自己的惯例有出入，他们就抨击这些学说；而恰恰是他们最受这些惯例的影响。并且一些顽固地为这些惯例辩护的人，与其说是想获得确定的知识，还不如说是害怕被说服。

所以，如果有人根据所有的生产现象以及最广泛的贸易经验，证明各国之间的自由来往对彼此都有益，而且证明对于经营外贸的个人最有利的的方式，必然同样对于经营外贸的国家也最有利，那么观点狭隘并傲慢自大的人就会指责某人的看法。要是问他们理由何在，他们就马上和你谈起贸易差额，并告诉你，很明显，一个国家必然会因为用货币交换货物而崩溃。这句话本身就是制度。有些人声称，流通使国家致富，一笔金额在转手二十次后就等于原值的二十倍；还有些人声称，奢侈有利于产业的发展，而节俭则招致商业各部门的衰败。这两句话也是臆说。这些人都求助于事实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就像牧羊人那样。牧羊人认为眼见为实，当他看见太阳朝出暮落时，就断言太阳在一天内穿越了整个天空，将行星界的规律视为无聊的梦话。

此外，在其他学科取得杰出成就但不了解这门科学原理的人，多倾向于认为，绝对真理仅限于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经细致观察及实验的结果。他们以为，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不包含不变的事实或无争议的真理，所以不能视为真正的科学，只能视为多少有些机敏却完全是武断的假说。这类哲学家的这种看法，是以研究这些科学的学者的看法不一致以及其中一些学者的狂妄谬论为根据的。但什么科学没有大胆的假说呢？那些最先进的科学完全脱离假说才多少年？相反，难道我们没看见理解有误的人至今仍攻击最为确定的学说主

张吗？对于我们生存所必需的水和每时每刻都呼吸的空气做出准确分析才不到四十年，而这个学说所依据的实验和证明仍不断受到攻击，尽管各国最精明和最谨慎的实验家所做的上千次实验和证明结果都相同。在比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中大多数事实都简单得多并显得多的事实的描述上，也存在不一致的看法。在物理学、化学、植物学、矿物学和生理学中充斥着的争论，不是与各种意见的争论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争论同样激烈吗？的确，争论双方观察到的是相同的事实，却以不同的方式来分类和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争论中，真正的科学家并未一致反对冒牌的科学家。莱布尼茨（Leibnitz）和牛顿（Newton）、林奈（Linnaeus）和朱西厄（Jussieu）、普里斯特利（Priestley）和拉瓦锡（Lavoisier）、索绪尔（Desaussure）和多洛米厄（Dolomieu），都是非凡的天才，却未能在科学学说上取得一致。但是，尽管他们并未达成一致，但他们所教授的科学不是还存在吗？^①

-
- ① 托伦斯上校（Col. Torrens）在他 1821 年发表的《论财富的生产》（*Essay on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中说：“当前在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大师中存在着的争论，已经由一个活泼机智的作者提出作为反对研究这门科学的理由。人类知识的每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类似的反对理由都可能提出来。数年前，当化学上的杰出发现开始替代古代燃素学说时，类似现在存在于政治经济学家中的争论，使自然科学家分化为不同的阵营。普里斯特利博士像马尔萨斯先生（Mr. Malthus）那样，以他自己所确定的事实有助于推翻一些理论的顽固的拥护者面目而出现。在人类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任何一门科学在它的研究者达成一致看法之前，必然有一个争论时期。但这并不是提供一个理由，使我们在这门学科的基本原理尚未确定前就放弃对它的研究，而应促进我们更热心和更执着地进行研究，直到在人类智力范围内，关于每个问题的疑问都消除了，并且得到了确定的知识为止。至于政治经济学，争论时期正在渡过，而看法一致时期正迅速到来。所以，几乎用不了二十年，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任何基本原理都将不存在什么疑问。”

托伦斯上校在 1826 年发表的《论对外谷物的贸易》（*Essay on the External Corn Trade*）第三版的前言中进一步说：“以前，作者曾大胆预言，在并不遥远的未来，政治经济学学者之间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同样，构成政治科学与伦理科学的一般事实，不受任何争论的影响继续存在着。因此，每一个人利用优势并通过准确无误的观察，都能够确定这些一般事实的存在，证明它们的关系，并推断出结论。这些结论就像客观世界的规律那样，的确是由事物的本质引发的，这些结论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通过细心观察与分析才为我们所知的。君王也好，臣民也罢，都得屈服于它们的权威，绝不能违背它们而不受责罚。

一般事实，或者如果你愿意可称为事实所遵循的一般规律，当它们与其应用相关时，就是说，当我们利用它们来确定我们面对的任何结合起来的情况的作用的规律时，便称为原则（principles）。对原则的认识提供了成功进行任何研究的唯一可靠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与精密科学一样，是由若干基本原理及其演绎的许多推论或结论组成的。因此，对于这门科学的进步所必须做的是，应根据观察严格推断这些原理，而这些原理所演绎的结论的数目，可由研究者随后按他拟定的研究目标来增减。要列举所有这些结论并加以适当解释，将是浩大的工程，并且必然会不完善。此外，这门科学越进步，它的影响越大，就越不需要从它的原理上去演绎结论，因为这些结论会自发地呈现在每个人眼前。而且由于这些结论在所有人的掌握范围内，因而就很容易被人们所应用。到那时，政治经济学的论著，将限于阐明若干一般原理，甚至不需要例证，因为这些论著将只不过是任何人所知原理的说明，按照便于理解它们的形式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范围而整理出来的。

然而，以为通过应用数学来解决一门科学的问题，就会使这门科学的研究更准确或得到更可靠的指导，那是毫无根据的。政治经

的争论将停止，意见将普遍一致。”他认为他已经看出这个预言趋于应验的明确迹象。自从他大胆预言后，已有两部著作问世，而每部著作的主要目的都是纠正它们所专门研究的问题在过去流行的错误。这两部著作是：无名氏所著《对价值的本质、原因和衡量的批判》（*A 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Causes, and Measures of Value*），以及图克（Tooke）所著《对价格高低的看法和详述》（*Thoughts and Details on High and Low Prices*）。——美国编者注

济学所涉及的价值 (values), 允许使用正 (plus) 和负 (minus) 之类的词, 这的确是属于数学研究的范围; 但同时受到人类的才能、需求和欲望的影响, 价值不易于精确评定, 所以不能提供用于绝对计算的数据 (data), 如在政治学和物理学中一样, 重要的是掌握因果关系的知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现象, 均不适用于严格的数学计算。^①

-
- ① 例如, 我们也许知道, 任何一年的葡萄酒价格, 必然取决于其销售数量与需求之比。但如果我们要对这两种数字进行数学计算, 那我们就必须在完全熟悉它们之前, 或在能略微准确地区别它们各自的影响之前, 先分析它们的要素。因而, 不仅必须确定下个葡萄收获期的产量, 而这要经受天气的变化, 而且还必须确定下个收获期的葡萄的质量、上个收获期的库存量、酒商所能支配的资金量, 以及他们因此必须比较迅速地收回他们垫付款的时间。我们还必须查明关于出口酒的可能性的看法; 而出口酒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我们对法律和政府的稳定性的看法, 这种看法经常变化; 而关于出口酒的可能性, 任何两个人的看法都不完全一致。我们必须正确评估所有这些数据以及可能所需的许多其他数据, 目的只是确定酒的流通量 (quantity to be put in circulation)。而这不过是价格 (price) 的要素之一。要确定酒的需求量 (quantity to be demanded), 我们必须知道酒在出售情况下的价格, 因为对酒的需求随着它的价格低廉而增加。我们还必须知道酒从前的库存量, 以及因人而异的消费者的口味和财力。消费者的购买力, 多少随着总体产业的发展情况和他们的富裕情况而不同; 他们的需要, 也随着他们掌握的用另一种酒 (如啤酒和苹果酒) 代替这种酒的其他方法的多少而不同。我删去许多对解决这个问题多少产生影响的不太重要之处, 因为我怀疑任何真正习惯运用数学分析的人竟敢如此尝试。这不仅是因为数据繁多, 而且还因为很难准确归纳它们的特性以及很难把它们的各自影响结合起来。而那些自以为能够这么做的人, 他们不能以分析性语言阐明这些问题而不使用简单化和任意删除等方法, 使这些问题失去原有的复杂性。这样做的后果由于不能恰当估计, 因而总会改变问题的本质, 歪曲它的结果, 以致从这种计算中所得出的推论, 与从任意想象的公式中所得出的推论并无不同。所以, 在他们的结论中, 并未认可精确的几何学研究所特有的和合性——在精确的几何学研究中, 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能得到它, 只看到空洞的、不确定的推论, 这些推论的差异常常等于所要确定的数量的差异。那么在说明如此复杂的问题时, 明智的研究者应采取什么方针呢?

上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宗旨以及彻底掌握其原理的最佳方法的论述，将为我们提供方法来了解迄今为止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古希腊人的文献，他们的立法、条约，以及他们对被征服省份的管理，都显示出他们完全不懂财富的本质及起源、财富的分配方式以及消费财富的影响。他们所知道的，在财产权为法律所认可的任何地方的人也都知道，即节俭增加财富，奢侈减少财富。色诺芬（Xenophon）赞美秩序、活力和智慧，认为它们是达到繁荣的可靠手段。他并未根据任何一般规律演绎出这些准则；也就是说，他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建议雅典人保护商业，并友好地接待外国人，但他不太清楚他的建议在什么程度上是恰当的，以致在另

他所采取的方针，与他在同样困难情况下所采取的以决定他一生中大部分行动的方针相同。他会研究所提问题的直接要素，并在确定这些要素之后（这在政治经济学中是能做到的），以机敏直觉的开明理解力，近似地评估出这些要素的相互影响。这本身只是一个手段，用它能估计大量可能性的平均结果，但绝不能精确计算这些结果。

卡巴尼斯（Cabanis）在叙述医学革命时，有一段讲话与上述说法完全相同：生命现象依靠在这么不同的情况下相联系的这么多的未知活力，靠观察去了解这种活力是徒劳的，这些问题的所有状况，由于不能全部叙述出来，因而也绝对不能去计算。所以，一旦机械学学者试图以他们的方法来说明生命规律时，他们为科学界提供了值得我们去最认真思考的奇观。他们所用的名词是正确的，其推理方法也完全合乎逻辑，可他们所得出的结果却全是错误的。此外，尽管所有计算者的语言及表达语言的方法相同，但每个人所得出的结果仍各不相同。正是由于把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完全适用的学科上，最异想天开的、荒谬绝伦的和自相矛盾的臆说才得以存在。

达兰伯特（D'Alembert）在其《流体动力学概述》（*Hydrodynamics*）中指出，血液通过血管的速度是绝对计算不出来的。塞纳比埃尔（Senebier）在其《论观察者的技术》（*Essai sur l'Art d'observer*）（第一卷，第81页）中也做了类似的论述。

无论有才能的教师和有见识的哲学家关于自然科学的结论说什么，都更适用于伦理哲学，并指出为什么当我们用数学计算说明政治经济学的现象时总受到误导。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成为最危险的抽象理论。